



20<sub>世纪</sub>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湖北教育出版社

褚斌杰/编

屈原研究

20<sub>世纪</sub>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of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褚斌杰/编

屈原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研究/褚斌杰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陈平原主编)

ISBN 7-5351-3544-7

I. 屈… II. 褚… III. ①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文学研究②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人物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06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20 印张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88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544-7/I·127

定价:31.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 说 明

一、为了弘扬学术、传承文化,我们推出了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以下简称为《文存》)。

二、《文存》是一套集多学科、多层次、多卷本而成的20世纪学术研究成果精华库,其每一卷都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导论、文选、目录索引,三者互为呼应。

三、《文存》中的“导论”和“目录索引”部分,均按现行的出版标准和规范进行排印。

四、对《文存》中的“文选”部分,需作如下说明:

1. 选文的时间范围: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2000年;
2. 选文的地域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对国外的原创之作不作统一要求;
3. 对所有入选的作品,一律采取简体横排;
4. 将原载中带有注码的注释统一改为篇末注,对括号内的夹注也进行了版式统一;

5. 对原载中的直接引文进行了版式统一；

6. 对原载中的标点符号(尤其是书名号、引号等)进行了版式统一；

7. 由于入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语言规范不一致,故对其原载文字不进行整体上的统一,也不一一校勘;这样既可以反映学术史的真实,同时也尊重了原文,保持了原貌,从而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8. 出于篇幅的考虑,少数长篇论文或论著进入《文存》时采取了节选的方式,并予以注明;节选部分的章节序码也完全依照原载;

9. 由于一些不可克服的原因,对少数经典论文采取了存目的方式。

五、特此说明,敬请广大读者鉴识。

## 总 序

陈平原

给 20 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决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来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论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 20 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吸引学界的目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今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对所收各文,除进行必要的版式统一(如简体横排、篇末注等)之外,其他

则尽量尊重原文保持原貌,这样既反映了学术史的真实,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2001 年 11 月 17 日于京北西三旗



总序/陈平原 .....	1
导论:百年屈学/褚斌杰 .....	1
屈原研究/梁启超 .....	10
读《楚辞》/胡适 .....	33
读《读〈楚辞〉》/陆侃如 .....	39
屈原及宋玉/鲁迅 .....	45
屈原考/郭沫若 .....	52
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浦江清 .....	65
摄提与孟陬/林庚 .....	84
屈原生年考辨/蒋南华 .....	93
史记屈原列传发疑/刘永济 .....	109
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 ——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赵逵夫 .....	118
楚国的“莫敖”之官与“屈氏”之族/蔡靖泉 .....	136
端午·龙舟·角黍·屈原 ——文化事象异源合流之一例/张正明 .....	146
屈原思想流派辨/殷光熹 .....	153
关于屈原三题/聂石樵 .....	167
屈原爱国论/温洪隆 .....	175

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 ——屈原个性研究/董楚平 .....	184
论班固评屈/李诚 .....	199
屈原与庄周美学理想异同辨/郭维森 .....	213
屈原与但丁/徐志啸 .....	225
简论屈子文学/姜亮夫 .....	240
楚辞女性中心说/游国恩 .....	253
楚辞用夏正说/游国恩 .....	263
说屈赋中之巫/姜亮夫 .....	271
试论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及其特色/毛庆 .....	274
论我国评骚理论家的“虚无说”/黄中模 .....	286
论《离骚》的自我形象/郭杰 .....	299
《离骚》的三次飞行/肖兵 .....	312
《离骚》“正则”、“灵均”解/褚斌杰 .....	327
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林庚 .....	332
战国宇宙本体大讨论与《天问》的产生/罗漫 .....	347
单一与丰富的有机结合 ——一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张宏洪 .....	363
读《九歌》/马其昶 .....	381
怎样读九歌/闻一多 .....	383
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褚斌杰 .....	399
《九歌》夜祭考/李大明 .....	415
《九歌》六论/潘啸龙 .....	429

---

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汤漳平 .....	445
《涉江》《哀郢》《怀沙》新论/周建忠 .....	460
《招魂》解题/陈子展 .....	468
《楚辞》成书之探索/汤炳正 .....	475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崔富章 .....	497
楚辞简帛释证/黄灵庚 .....	512
20世纪屈原研究论文目录索引/黄筠 编 .....	523
后记/褚斌杰 .....	622

## 导论：百年屈学

褚斌杰

屈原研究，或云屈学或楚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汉代刘向、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算起，延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学术发轫于先秦，汉代尊儒家著作为不刊之经典，通过解释学而建立起一门儒学。而诗人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却几乎同样早地受到关注与推崇，获得“与日月齐光”的美誉，经汉越宋至清，流布千年，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学术史上的“显学”。

近一个世纪以来，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巨大转型期，其变化之大，发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屈学，也经历了巨大转型和发展变化过程。至为可喜的是，如大家所感、所见，屈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在我们这一代，不仅获得了持续发展，而更以新的面貌达到了空前繁荣。

屈学的发展、繁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绝非完全是纯学术兴趣，更主要的乃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正因为如此，屈学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它不仅随着历代学术（诸相邻学科）的发展而发展，更随着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和需要而显示其日久弥新的生命力。纵观历代

屈学史,在持续发展中无不具有时代的烙印。

20 世纪的屈学,有着显著的时代特点。

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屈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从世纪之交至“五四”前后,是屈学开始转型期的第一个阶段。清末民初在楚辞学领域虽然出现了像马其昶的《楚辞微》、刘师培的《楚辞考异》等对楚辞文本进行考证、注释,且功力深厚的著作,但从治学方法上说,还只是沿习了清代朴学的余绪,尚少新的发明。而梁启超、王国维研读楚辞著作的问世,则是近世屈学发展开始转型的标志。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的梁启超,虽不以楚辞研究为其治学的主要方向,但他于 1922 年发表的《屈原研究》和 1923 年发表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部分),却别开生面,开近代楚辞学之先河。梁氏在研究楚辞中,虽也依传统注重对文献的考证,但在分析和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却开始运用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艺观点。如他说“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从而在屈原研究中既注意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探究,又注意对屈原心理的剖析和人格的张扬。如他以“感情中心”说,作为理解屈原诗歌的基础,以“矛盾心理”分析诗人屈原的悲剧性,认为屈原为尽国家、民族的义务而死,“成就了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磨相荡。”他还以“想像力”、“浪漫式”等现代文艺学观念来说明屈原作品的文学特点,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令人耳目一新的。他又进一步将楚辞与《诗经》相比较,认为“三百篇”是“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是“富于想像力之纯文学”。他还首次将屈原及其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范围内考察,将楚辞与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比较,与希腊神话相比较。这些在近世楚辞研究中耳熟能详的观点和方法,正是由梁氏在 20 年代启其端的。

当然,屈学始终有它的特殊性。除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外,由于从历史文献上积淀下来的众多问题,古文献的考证、辨析和研

究,也始终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以后的30年,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是同时开展的。从治楚辞的学者来看,不同的人虽有所偏重,但往往也是相兼的。大家知道,学者闻一多在楚辞的校补、解诂、疏正方面下过很大工夫,并有传世之作,但其治楚辞的主要贡献是把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引入楚辞的研究之中,开对楚辞进行文化综合研究之先。游国恩先生虽主要贡献在训诂、考据,但他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其本身,还从楚国的民间文学、地域性诸方面溯其源,并从历史的继承角度对屈原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创造做深入探讨。他在解释屈作时多方面纠正了汉、宋旧说,对楚辞研究有继往开来之功。郭沫若以其学问的博识和革命诗人的热情介入楚辞研究,并且是现代第一个尝试用唯物史观研究屈原的学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民族矛盾尖锐和黑暗政治统治的特殊背景下,对屈原的民族精神和政治革新思想做了大力的传播,使屈学研究与时需要相紧密结合。又首先利用今译的方式、话剧的创作,向社会传播屈原的楚辞作品和伟大诗人的不朽人格和精神。其他如鲁迅、刘永济、谢无量、郑振铎、胡小石、卫仲璠、姜亮夫、陆侃如、林庚、苏雪林等,都为新楚辞学在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当时,大陆上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当时尚健在的老一代学者都乐于尝试着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研究学术问题。

1953年恰逢屈原逝世2230周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这一活动促使了中国学术界对屈原进行研究的少有高潮。当时全国各报刊都有有关屈原研究的论文发表,其中有知名学者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俞平伯、游国恩、林庚、陆侃如、何其芳、朱东润、孙作云等,也有年轻一代的作者。并出版了新中国后第一部《楚辞研究论文集》。这一活动至今使人记忆犹新,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后,尝试用新的观

点研究屈原的开始,如在当时占主导性的文章中,开始使用“爱国主义”、“人民性”、“政治革新”和“历史进步性”等来肯定屈原。从此以后,在相当一个时期,这也成为学术界、古代文学研究中,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古代作家的尺度。而其更重大的意义远不止此,在当时,通过研究屈原、纪念屈原,还极大地推动了重新认识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热情,反对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为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古典文学研究创造了契机,打下了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屈学研究,像其他学术文化领域一样,实际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即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和1979年至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多年,虽然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不断,但屈学研究还是取得相当成绩。如屈学著作的古籍整理出版,老一代屈原学者论著的重印和新的屈学论著的出版,都仍在相对正常地进行。郭沫若的《屈原研究》、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朱季海的《楚辞解故》、王泗原的《离骚语文疏解》、詹安泰的《离骚注疏》,这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以及马茂元、陆侃如、文怀沙的楚辞选注本、今译本等,都为屈学在新时代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自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包括屈原研究在内,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而这时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在完全由当时政治需要和操纵下发起的所谓“评法批儒”运动中,关于屈原“法家”思想的研究。当然这已与学术研究无关,是不足为训的。

80年代初至今,2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中国社会与学术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令人惊叹。在这一情况下,也迎来了屈学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如前所述,在此以前中国屈学也与其他学术、学科一样,曾经

历了两次观念的更新和方法的变革。“五四”时期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俄国 19 世纪民主主义文艺家的理论和前苏联的批评模式。而 80 年代以后在克服学术思想政治化、单一化的倾向后，出现了文学研究多角度，理论、方法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屈学研究中，就是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和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同时，屈学研究者队伍的迅速扩大和研究成果数量的猛增，更是这一屈学研究高潮的标志。

过去的学者曾将楚辞研究的范围划分为四大类，如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曾将楚辞研究划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类。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分为“辑注、考证、音义、论评”四类。这大致反映了传统楚辞学的范围和主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屈学研究中，新的角度不断出现，新的门类不断形成，旧有的分类已不适应现代屈学的研究现状。从而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对屈学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对屈学内容做更全面、更细致、更科学的划分。如有人提出将现代楚辞学划分为楚辞考古学、楚辞神话学、楚辞宗教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地理学、楚辞辨伪学、楚辞文化学、楚辞作家学、楚辞艺术评论学、楚辞艺术心理学、楚辞译注学、楚辞接受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博物学和楚辞改编学等 15 类（见罗漫《关于楚辞学科建设的思考》）。也有人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概括并加子目，以避免叠合、交叉。这一工作虽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宽和逐渐迈上现代化的情况。

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宽，首先表现在将楚辞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博物学）做交叉研究，以深入地解决楚辞的产生和楚辞文本中存在的诸多疑难问题，以及相应地说明楚辞在古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和贡献。特别是利用新的考古成果，借助近些年来关于楚史、楚文化研究的硕果，来进一步考察屈原的思想渊源、骚型艺术的形成，以及解决楚辞作品中的诸多文物、语言、史实



的问题,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近年来比较文学勃兴,又开拓了把民族诗人屈原引入世界文化、文学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为丰富世界诗学、诗学理论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关于屈原的生平(包括有无其人,生卒年、族别、乡里、流放次数、路线、任职、列传记载等)、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美学思想、思想所属流派等)、作品(包括篇目、真伪、系年、文体、题意、性质、版本、错简、文字训诂、音韵、语言、艺术特征等),以及楚辞的新注、新解、今译等,都在既往基础上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大量的论著。同时在学术民主的气氛下,不断展开互相商榷、讨论和论争。近年来规模较大的论争就有三次:一是又一次出现关于屈原是否有其人的论争,二是关于屈原有否爱国思想的论争,三是关于楚辞研究中巫化倾向的论争。

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本是不争的事实。但20世纪之初,就有人力图从否定屈原作品开始,进而否定屈原其人的历史存在。其始作俑者为四川今文学家廖平,他在其《楚辞新解》、《楚辞讲义》等著述中,认为楚辞乃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是汉人恶秦而归之于屈原名下,从而基本上否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著作权。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史记·屈原列传》有七大可疑处,从而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此后何天行、朱东润等人亦有相应之论。这种在疑古思潮之下的轻疑妄说,当然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批日本学者如铃木修次、三泽玲尔、白川静和稻田耕等人,又相继提出否定屈原存在的言论,从而引起中国许多学者的再次起而驳正,著名学者姜亮夫、汤炳正、郭维森、屈守元以及众多的中青年学者都纷纷著文参加论争,一时又成为屈学的热门话题。

80年代中期,还发生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关于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讨论。其讨论是由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引起的。作者认为屈原并无鲜明的爱国观念与意识,屈子